

論《日瓦戈醫生》的勞動書寫與美感

黃文倩

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被瑞典科學院宣布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儘管他是詩歌上的成就被肯定，並非主因1956年的代表作《日瓦戈醫生》（台譯：《齊瓦哥醫生》）獲獎，但是，帕斯捷爾納克宣布拒絕接受該獎項，並表達了不願意離開俄國的決定。然而，這部作品與獲獎事件本身，無疑地，跟當年蘇聯和西方世界在冷戰的結構下，相互爭取世界話語權與思想影響力不無關係。

就《日瓦戈醫生》實際出版的狀況來說，根據藍英年、張秉衡的《日瓦戈醫生》的〈譯者序〉（1986年初稿，2005年修訂版）的相關說法，帕斯捷爾納克在1948年開始撰寫此作，用了8年的時間完成，爾後，由於當時蘇聯境內的《新世界》雜誌社不同意出版，小說最終在意大利共產黨員費爾特里內利的幫助下，於1956年先在米蘭出版，後來亦有法譯本和英譯本。當然，這本書及他向外尋求出版的舉動，也讓作者遭受到蘇聯內部的嚴厲批判，作者在幾年後過逝。一直到1988年1月，距離他「拒絕」諾貝爾文學獎的30年後，《新世界》雜誌社才正式刊登了《日瓦戈醫生》，並給予他遲來的正名與榮耀。¹

《日瓦戈醫生》在中國大陸很早就被引進，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改革開放後，也曾引起了一波閱讀的熱潮，洪子誠在《我的閱讀史》專章討論《日瓦戈醫生》（台版《閱讀經驗》亦有收）就曾提到：「大約是到了60年代，內部出版的《外國文學參考資料》，才編載有這部小說的梗概，和國外的一些評論文章」²，洪子誠的言外之意可能包括——五〇年代末大陸雖已引進《日瓦戈醫生》並對它進行批判，與蘇聯當年對此作的批判，大多均未建立在完整與相對細緻的閱讀事實，在冷戰角力的結構下解讀，西方因蘇聯出了一部似乎質疑十月革命及社會主義的作品，而有了順勢坐實批判的巧徑，而在蘇聯這邊，《日瓦戈醫生》也容易被簡化為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革命，及將兩大主人公（如日瓦戈醫生和拉拉）往資產階級及個人主義等框架來粗暴化約理解。我自己閱讀《日瓦戈醫生》的感受與理解也是如此——此作的許多中間環節、視野、哲理及審美深度，不一定能坐實成兩極左右判斷的細節，也無法簡化成革命與人道主義的框架，因

¹ 參見藍英年、張秉衡譯《日瓦戈醫生·譯者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1-6。本文引註的《日瓦戈醫生》的版本均出於此作。

² 洪子誠《我的閱讀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39。

此實有再解讀與補充的空間。小說的幅射意義絕非一般兩極敘述、簡單的立場與道德能概括。

—

從文學史及現實主義文學理論流變的角度來看《日瓦戈醫生》，此作可以視為對蘇聯二十世紀初的社會主義及文學的一種反映與想像的綜合生產結果。它創作年份在1948-1956，在此之前，俄國長期一直有著嚴肅地對社會、歷史、革命、知識分子與一般人民命運思考的作品。從理論的發展意義來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發生，是為了克服「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所存在的一些「文學」困境，所以，它在理論層面上強調突出新人，在階級視野上突出勞動人民，在立場上尊重進步的黨，在敘事與價值上的目的／結果上重視光明與希望，在功能上，甚至要有教化人民的意義³，然而，也由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歷史上有一定程度上的由上到下的黨的主導，或難免為了「神聖」或某種抽象的理想，先驗式地決定／預設了寫作的目的，其理論本身對作家創作的相對自由，也會造成一定的抑制。不過，這種抑制究竟是好是壞，甚至是否全無意義，是一個需要從具體作品個案來討論的問題，不應簡單使用抽象理論與常識的觀念來回應與批判（何況我們還在後冷戰的歷史語境與餘波下）。

在以上思考脈絡下延伸，儘管筆者不願意直接判斷《日瓦戈醫生》是一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品，但它確實跟一般「批判現實主義」的經典作品不同。無論在立場、敘事、價值傾向和藝術特質上，都有殊異的品味與偏好，它確實不是由上到下的黨性所規定或期望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品。《日瓦戈醫生》生產於這兩種現實主義觀／理論出現之後，既有著肯定革命、突出勞動、人民、新人、善即是美等等的價值，同時也保留了對當中的部分彈性與質疑。此中思想和審美的面向與結構，跟大陸新時期八〇年代中之前的作品傾向有些類似——一方面保有著一些昔日並不教條的社會主義理想及實踐想像，二方面亦對社會主義的歷史的負面性或說挫折有揭露與反省，誠如蔡翔在《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所曾提醒的，

³ 參見《當代文學關鍵詞》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些重要概括：1934年的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的會通過的《蘇聯作家協會章程》中說：「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以及馬林科夫在聯共十九大的報告，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具體的要求：「我們的作家和藝術家必須在作品中無情地批評在社會中遇到的錯誤、缺點和不健康現象；他們必須創造正面的藝術形象，表現新型人物的人格的光輝燦爛，……必須大膽地表現生活的矛盾和衝突，必須善於使用批評的武器，把它當做一個有效的教育工具。現實主義藝術的力量和意義就在於，它能夠而且必須發掘和表現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質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質，創造值得做別人的模範和效仿對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藝術形象。……典型性是和一定社會——歷史現象的本質相一致的，它不僅僅是最普遍的、時常發生的和平常的現象。」洪子誠、孟繁華主編《當代文學關鍵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17。

在今天：「我們不可能僅僅停留在對中國革命的正當性的強調上，相反，……這一正當性所創造出來的巨大的經驗形態，還在於這一正當性又如何生產出了它的無理性。」⁴當然，蔡翔的工作乃是企圖從 1949-1966 這個階段的歷史與作品中，清理與反省當代中國曾經擁有的社會主義及其文學的正面資源，以面對「神聖」崩毀後的困局。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蔡翔論述的終極意義，仍然是要重構、甚至想像一種理想的社會主義（含文學）及其實踐，並將其作用於抵抗今日的資本主義與異化下的中國。

本文的思考方法與進路擬向正典／經典回溯，既然中國的社會主義及其文學實踐，在歷史與事實上深受蘇聯影響，若能豐富地理解像《日瓦戈醫生》這樣的作品，它對社會主義實踐、困境及其可能的理論和想像，它對個人特殊性與集體價值的思考，對日常與個人情感的需求，對詩意、大自然與才能的尊重，是否也能作為一些思想與審美資源的累積，以補充中國甚至其它地區日後理想的文學發展的實踐與想像呢？儘管，日後的現當代小說與理論，不見得要使用「社會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樣的概念。

二

作為一部正典／經典的文學作品，《日瓦戈醫生》以長篇小說的篇幅，分上、下兩卷，共十七章（含詩作），小說開篇在 1903 年，終結在 40 年代左右，但重心在 1910-1920 年代，整體上是以男女主人公日瓦戈及拉拉的命運發展為核心，聯繫並思考俄國 20 世紀初期的諸多重大革命歷史的發生，及隨之而來的紅白軍戰爭影響下的社會、生活與人心巨變。

在我所蒐集與閱讀到的一些材料／文獻討論中，即使是在看似脫離冷戰的新歷史階段，學者或批評家們，對《日瓦戈醫生》的理解，多地朝向了另一種坐實「個人」、「自由」、「人性」、反對與全面否定革命與暴力的傾向，⁵即使是 2014 年台灣完整地引

⁴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

⁵ 舉例來說，孫磊〈反「國家主義」的「自由個體」敘事——《日瓦戈醫生》的隱事倫理爭議〉，《當代外國文學》，2015 年第 1 期，頁 113 說：「《日瓦戈醫生》的核心內容是講日瓦戈的人生命運的，是講他如何認識生活和對待生活的。……講述了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期所經歷的生命苦旅及存在之殤，傳達了一種「念家」甚於「憂國」，「討生活」重於「干革命」的倫理思想，以自由個體的倫理敘事取代了國家主義的倫理敘事。」。

劉守平〈《日瓦戈醫生》：主體命運的反思〉，《國外文學（季刊）》，1998 年第 4 期，頁 107 則認為：「它既含有蘇聯國內戰爭時期殘酷的現實所造成的社會動蕩的因素，又含有革命中左傾思想所帶來的災難性的因素，同時又具有主人公在現實中所懷抱的人生理想超越當時現實的可能性的因素，但是，他的追求是一種崇尚個性價值、呼喚人性完善的追求，肯定人的主體命運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理性價值和意義。」。

趙山奎〈拉拉：反抗卑賤——析《日瓦戈醫生》中的拉拉〉，《俄羅斯文藝》，2002 年第 5 期，頁 61：「《日瓦戈醫生》是一部啟示錄式的作品，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深刻的焦慮與莫名的恐懼。」。孟晶磊〈從《日瓦戈醫生》看俄國革命中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 年第 4 期，頁 56：

進了藍英年全譯的《齊瓦哥醫生》的版本，藍在此版本的譯後記中，也作出甚至較早年更為簡化的概括與判斷：「暴力革命毀壞了社會生活，使歷史倒退。……在帕斯捷爾納克看來，那場革命是一切不幸的根源，內戰使歷史倒退，倒退到洪荒年代。」⁶如果說藍英年先生的後記，多少帶有著一定的個人經驗與情感的影響，或許也不無曾身在中國社會主義挫折經驗下的投射，但這些判斷跟《日瓦戈醫生》內在實際複雜的層次有不小的差異。

帕斯捷爾納克是一位對俄羅斯有著深刻祖國情懷的作家，以賽亞·伯林在《個人印象》中曾說：「帕斯捷爾納克熱愛俄羅斯的一切，心甘情願地原諒祖國的所有缺點……他盡力用眼睛搜尋晨曦——他在《日瓦戈醫生》最後幾章表達了這個希望。他相信自己與俄羅斯民族的精神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分擔它的希望、恐懼和夢想，表達它的聲音」⁷，帕斯捷爾納克沒有自外於自己的國家，他是俄國人民的一份子。

正是這種將自己內在於社會主義革命與「人民」的立場，而非「外人」的主體，是作者能書寫出《日瓦戈醫生》的各式豐富視野與內涵深度的關鍵。作者在此部作品中，雖然對社會主義革命與實踐、暴力和戰爭，有一定程度上的懷疑，但他對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以及革命對社會、一般人民、知識份子等帶來的新生與推進意義，也仍有一些人類學見識上的肯定。即使隨著小說歷史時間的發展，作品中帶出了俄國的紅白軍爭戰和社會主義革命造成了新的社會困境，和生命、天才與質樸價值的耗損，帕斯捷爾納克都仍在作品中，體現了一種真誠、善意與相對公平地觀察不同階層的眼光，努力理解每一個角色，並且為他們各自的存在意義與特殊性辯護。

三

一種重要的重新理解的起點是勞動書寫。勞動是《日瓦戈醫生》的一個獨特視野，也是社會主義文學和革命實踐中的重要命題。在當代中國的許多的革命歷史小說中，勞動敘事也歷經了許多變化，受到毛澤東四〇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勞動時常與知識分子的個人改造，及主體往集體實踐轉化等聯繫在一起，並且

「在日瓦戈醫生身上還體現人道主義精神追求，他崇尚個人理性、向往個人自由，反對一切暴力。……再現了俄羅斯知識分子固有的一種內在的精神，其對俄國歷史的思考的非政治性，恰恰是這部小說的價值所在。」

何潔芳〈試析《日瓦戈醫生》安季波夫的悲劇性及其意義〉，《名作欣賞》，2012年第6期，頁70：「縱觀安季波夫一生，從他愛戀家庭——拋棄家庭——參加革命——回歸家庭（被革命拋棄後）的人生軌跡，不難發現其人性的變化：充滿人性——失去人性——回歸人性。」、「安季波夫和日瓦戈這兩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一個「人世」（安季波夫），不乏盲目而冒進，一個「出世」（日瓦戈醫生），不乏守舊和消極；無論積極或消極，最終都避免不了悲慘的結局，這就是悲劇性的審美魅力所在。」

⁶ 藍英年〈《日瓦戈醫生》譯後記〉，收入《齊瓦哥醫生》，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14年，頁602。

⁷ 以賽亞·伯林〈1948年和1956年與俄羅斯作家的會面〉，收入《個人印象》，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頁216-217。

被視為一種進步路線。如早期丁玲的〈在醫院中〉、〈我在霞村的日子〉、楊沫《青春之歌》、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而到了柳青《創業史》那裡，則又發展出組織農民進行集體的社會主義農村的合作化等工作與實踐。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勞動在歷史與社會主義的實踐上，有時成也作為一種規訓與懲罰的手段，在早年張賢亮（如《綠化樹》、《男人的另一半是女人》）、高曉聲（如《臨近終點站》、《青天在上》等自傳性作品）及從維熙等「右派」小說家及其作品中，可以看到許多「過勞」卻努力理解成正面的自我改造的「勞改」書寫。

無疑地，這樣「歷史化」的勞動敘事在其社會主義文學的邏輯下，曾經被賦予較高的價值。蔡翔在討論社會主義的勞動，跟生活世界的想像與創造的關係時，說勞動者：「這一地位不僅是政治的，經濟的，也是倫理的和情感的，並進而要求創造一個新的生活世界。作為一種震蕩也是回應的方式，當代文學也同時依據這一概念組織自己的敘事活動。」⁸蔡翔在這裡指的勞動者，他們是社會主義核心生產與進步的角色，並且發展與建構出自身的敘事與主體性，進而也促進弱勢他者的解放，以中國昔日的社會主義實踐，農工兵等無產階級確實占社會的主要人口，這樣的建構傾向不能說沒有其歷史合理性。

然而，「勞動」作為一種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主題，儘管在昔日的社會主義道德與倫理意義上備受肯定，也在一定的政治正確及文化意義上受到推崇，但在文學實踐上，長期不容迴避卻受到擱置的矛盾，恰恰不是各階級與勞動的正面書寫，而是即使是有進步階級視野下的勞動，亦有其過勞、規訓與懲戒等難以面對的感性與事實。換句話說，當我們從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推崇「勞動」的文學書寫時，理念／觀念上的肯定「勞動改造」或「勞動」本身，一旦背後沒有了公共政治作為話語權的力量後，事實上恐怕不能在思想及審美上充份地說服與感動我們。

《日瓦戈醫生》的主要男主人公——日瓦戈（尤里）和女主人公拉拉，雖然不能算農工兵階級意義上的「勞動者」，更接近的是支持與認同社會主義革命的同路人，但在此部作品中，我們看到作者自覺描寫他們的許多勞動狀態，並賦予他們在這種行為下較高的價值（包含審美價值）。

首先，男主人公日瓦戈和他的家人，不但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將自己家產的大部分毫不勉強地捐出來，甚至對那些多餘的傢俱、多餘的情感釋放沒什麼遺憾⁹，十月革命以後的俄國和隨後而來的經濟與物資蕭條，主人公舉家亦陷入了經濟和糧食

⁸ 同註4，蔡翔(2010)，頁224。

⁹ 《日瓦戈醫生》，頁164-165，日瓦戈這樣表述把自家的房子讓出去的反省與心態：「有錢人家的生活當中的確有些不健全的東西，多餘的東西簡直數也數不清。比如家裡那些多餘的傢俱和房間，多餘的細膩的情感，多餘的表達方式。」

上的困境¹⁰，日瓦戈對這樣的新的現實，抱持著的心態均是較為無我且善意的。總的來說，他並不是依靠原生資產階級家庭的經濟而不勞動的人。

在世界觀與立場上，日瓦戈對舊時代高度的矛盾下，最終發生戰爭與革命的意義並非簡化，他能很中性地看待俄國社會與革命的發生與變化下的價值與肯定新生，同時對一切的弱勢者心存善念，從最初看到拉拉失手槍擊科馬羅夫斯基，日瓦戈完全沒有原生資產階級維護同階級的傾向，揣想的反而是這個女孩（拉拉）日後的未來（即使她這個刺殺律師的行為確實有錯誤）。而拉拉雖然因為受到母親平庸又軟弱的影響，在年輕時曾誤入歧途——被律師科馬羅夫斯基以金錢、情欲和虛榮色誘，但小說極力地開展她對社會主義新人（例如拉拉的青梅竹馬，出身基層後來加入革命軍的先生帕沙）的支持與愛護，並且在跟帕沙結婚後，更多地承擔家務與事業的勞動，甚至成全帕沙走向一線革命的選擇。小說就在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歷史的條件下，他們以積極的第一線勞動和實踐，投入新社會與生活，也在以「人民」為主體性的認同下，作品中真誠地體察革命動態變化下的具體問題與限制。

其次，當男主人公的勞動進入到歷史化的戰場視域後，他對於創傷的身體感，對戰爭的殘酷亦有更深切的感同身受。作者並非採取上綱到抽象與普世觀，以求進一步批判戰爭的罪惡與傷害，而是讓小說人物在一線的目睹下，發生對個體生命的不忍與憐憫。此時，對方的身體也不僅僅是醫生勞動療救的客體，而是被見證的異化與物化的不像人的某些東西與形狀。這樣尊重具體個別生命的感性，還原他們的痛苦有如親見的細節，比抽象對戰爭的批判要來的更為有力。

第三，作者對勞動、精神與情感關係有較深入的融合思考，帕斯捷爾納克賦予了勞動實踐背後極高的精神與情感力量，這方面具有獨創性的書寫，體現在小說第五章——主人公他和情人拉拉的愛情的發生，並非起源於世俗意義的情欲或個人身體上的需求，他對家庭和妻子也沒有任何不滿，他的妻子對日瓦戈很理解也很善良，日瓦戈跟拉拉的婚外情感的觸媒與發展，因此不能看作經典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中的婚外戀的敘事譜系。愛情的起源，在《日瓦戈醫生》這邊，跟個人化的情欲、愛及被愛的虛榮無關，更多的是一種對生命中的純粹美好的肯定與需要。具體到小說中的細節分析，就是日瓦戈離家在外，又在戰場後方目睹太多人為的、有時候也基於實踐革命理想下的殘酷，在頻繁的血腥和疲乏救援的勞動工作中，拉拉（安季波娃）的出現及與世無

¹⁰ 參照張建華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地位〉，《《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指出：「十月革命前，俄國約有300個科研機構，連同高校裡的教授，高級知識份子隊伍大約有1.1萬人，他們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水準都處於相對優越的地位。1836年實行科學院的新“章程”時，院士的年薪為5000盧布，相當於俄國貴族一年的收入。至十月革命前，大學教授或科學院院士的年平均收入仍比產業工人高20-30倍。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力求使任何勞動者報酬一律平等，帝俄時代知識份子和技術專家享有的特殊地位隨之喪失。」

爭，她自然的勞動與美麗、平靜與內斂，均讓他耳目一新，讓他重新感受到生命的新意，這並非是個人意義上對某個個別對象的美，或由欲望下引發的愛情，而是與日瓦戈的勞動意識聯繫在一起的一種精神情感。

而從拉拉這個角色來分析，作者主要在賦予勞動之於她的積極成長與變化的價值。但不同於教條式的社會主義意義下的「改造」，也並非一般西方成長小說（一般均關注的男性而非女性的「成長」），或中國「紅色經典」中女性藉由某些外在啟蒙（尤其是來自於男性的啟蒙）和投身革命行動意義下的「成長」。拉拉在小說中支持革命自不用說，但之於她的成長，更多的是來自於她的一系列自主的勞動實踐。

例如拉拉為了擺脫男律師科馬羅夫斯基的糾纏，無論是立即去找家庭教師和管家的工作，或者結婚，照顧家庭、先生、孩子的義務及自身的教學工作，甚至當帕沙選擇走向一線革命，她亦投身戰場的護士工作，拉拉都相當認同她的忙碌的勞動生活，甚至覺得很幸福¹¹。這當中的前提是，這些勞動之於拉拉都是自願的而非懲罰性質。在整個成長過程中，她還不時還偷偷資助帕沙被流放的父親，資助他生病的母親，秘密地設法減輕帕沙的個人開銷，背地裡替他向房東貼補食宿費等等。拉拉事實上是依靠了勞動實踐和自主付出，才全面完成她的成長與主體的成熟。

值得注意的還有，帕斯捷爾納克有一種對人的高度善意且有「主人道德」的人文思考，他讓拉拉進入各式勞動以為自我改造，並非因為他覺得拉拉先前犯了錯誤需要「贖罪」——在許多過去的革命歷史小說（無論是中國的革命歷史小說，或蘇聯的小說均有這種個案）中，我們都不難看見，主人公進入勞動主體改造，通常被暗示著過去有錯，無論是基於歷史觀的錯誤或個人的錯誤，主人們帶著慚愧進行主體改造，但那當中仍然擱置與迴避了造成主人公犯下錯誤的、也是另一些歷史化下的政治限制。但在《日瓦戈醫生》中，作者賦予拉拉的是，始終覺得自己沒有什麼錯誤——只是一時軟弱而已。因此，當她透過勞動來進行主體成長時，就更顯得更為有力，她的靈性和生命力，也因此沒有因為這種強力的勞動而失去生命和心胸的彈性與自然。小說因此幾乎沒有常見的革命歷史小說的勞動改造書寫中，時常存在的艱辛、悲苦與懷疑。相反的，她身上始終保持一種讓各方男主人公們傾慕的精神力量，無論是日瓦戈、帕沙，甚至科馬羅夫斯基，在觀看拉拉時均對她的這種特質感到驚訝。從這個角度來說，拉拉是現代文學史上獨特的且具有進步意義的女性新主人公。

¹¹ 例如小說這樣描寫：「拉拉完全被辛勞和操心的事占據了。她要照管一個家和三歲的小女兒卡堅卡。……她自己還在女子中學教課，拉拉毫不懈怠地工作著，感到很幸福。這正是她渴望的那種生活。……拉拉總是眷戀著土地和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頁 102。

四

《日瓦戈醫生》還開展出對勞動與磨損的關係的反思，以及克服它們的方法——向大自然聯繫。無論是日瓦戈或拉拉，當他們在過度投入工作而太過疲累時，他們均透過在大自然中獲得消解與安頓。這種安頓並非僅僅是身體和古典審美意義上的療癒，更是一種自主性的將人的工具性弱化，以回復到完整的人與彈性，儘管勞動是有價值與精神的，但過勞不是。

同時，在此作中，大自然亦不只是現代性意義上被觀看、被征服與審美的對象或客體，人就是大自然、天地萬物宇宙的一部分，隸屬於大自然的作品或結果的其中一部分，不是開發者與征服者的角色。這種將人弱化，對大自然的敬畏的思維方式和感性，讓這部作品因此時常帶有一種謙卑、寬闊及優美的氣度。例如小說描寫到拉拉擔任家庭教師時，有時過於勞累，使得「她心緒不大好，變得神經過敏，這是先前所沒有的。這個特點使她變得心胸狹窄，而她的性格一向是開朗而不拘小節的。」¹²那什麼樣狀態的拉拉，更體現了作者心目中，對於人更為完整的觀點和審美特質呢？小說以非常優美的場景，來體現、隱喻拉拉的心路歷程與道路：

拉拉沿著鐵路路基在一條由朝聖的香客踩出的路上走著，然後拐進一條通到樹林子裡去的小徑。她不時停下腳步，眯起眼睛，呼吸著曠野中彌漫著花香的空氣。這裡的空氣比父母更可親，比情人更可愛，比書本更有智慧。霎時間，生存的意義又展現在拉拉面前。這時她領悟到，她活在世上為的是解開大地非凡的美妙之謎，並叫出所有的事物的名稱來，如果她力不勝任，那就憑借著對生活的熱愛養育後代，讓他們替她完成這項事業。¹³（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段話中的敘事結構和思考邏輯甚有胸襟——拉拉踩在「朝聖」的前人所踩出的路，然後在樹林的小徑中感受到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力，領悟出此時此刻比親人、情人、書本更有價值的感覺與意義。這並非是拉拉不重視親人、情人與書本，在小說中的各式細節裡，可以看出她對親人、人民與知識的深刻關愛，但是，小說在這裡體現的思考深度是，生命中亦還有其它非「人」的大自然與偶然的「小徑」，那些小徑引領著我們放下人與人、人與知識（書本）間的難免的磨損，甚至無盡地追求知識、追求革命的發展欲望。女主人公至此心胸遼闊，大自然充滿奧祕與神秘，許多事物仍待命名與發現，她是走在這條路與道上的一份子，因此才能沒有對大自然征服的立場——將自己標高於自然之上，「如果力不勝任」，拉拉仍將以一個女性的本能養育後代——小說的情節發

¹² 《日瓦戈醫生》，頁 73。

¹³ 同上註，頁 73。

展亦如此，儘管拉拉為了尋夫投身軍旅的護士工作，但她心中仍惦念著將孩子視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責任，這不能簡單地說是女性個人主義式的家庭窄化追求。

進一步參照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遇》(台譯:《人的條件》)中對勞動的一些觀點，來解讀小說在處理勞動和磨損關係的深度，阿倫特認為應該將廣義的勞動劃分為「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對應的是人的動物性，所滿足的是人的暫時性的消費需求，阿倫特說:「這個社會不是出自勞動階級的解放，而是出自勞動活動本身的解放，……無論我們做什麼，我們都是為了『謀生』」¹⁴，這個觀點可以讓我們意識到，為什麼勞動過甚所派生出的是「過勞」，而不是更多的價值，「過勞」不儘無法促進人的滿足，還耗損了我們的生命。因為人的生活與生存的意義、活著的價值，不應該僅止於暫時性的消費與「謀生」。所以，我們要有能展現自身意義的「工作」(阿倫特認為「勞動」不一定能展現自身意義，「工作」意謂著有主體的自主性的投入)，但是，阿倫特同時還指出，動物性的「勞動」和個人化的「工作」，都可能沒有公共性(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性)，所以阿倫特更強調結合以上兩者性質的「行動」——一種透過主體的參與，向他人展現自身的存在，人的意義亦在此(行動)中得到彰顯。總的來說，過勞、勞改或具有懲罰性質的歷史勞動，由於喪失了主體的自由意志的參與，最多只能是另一種「謀生」或維持生存的手段，其體現的也就並非是完整意義上的人。

在這樣的參照下，本文認為，《日瓦戈醫生》確實體現了勞動的多種層次——有基本的謀生的「勞動」，有與他人無涉的「工作」，但更多的時候，無論是日瓦戈或拉拉，他們的勞動都是自主的「行動」，他們在主體發展、承擔家務與療救戰場人民的責任上，更多是帶著自由主體的實踐，儘管他們的終極目的，並不一定是全然「神聖」的為了人民，但客觀效果確實是有公共意義的「行動」，而不是窄化下的獨立「勞動」與「工作」。

¹⁴ 漢娜·阿倫特原著，黃真麗譯《人的境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91。